

引 言

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封建社会后期，元、明、清三朝先后在这里建都，历时近七百年。作为国都，当时它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三个朝代在这座特定的舞台上无不展示过波澜起伏的历史画卷。而明清政权鼎革之际，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矛盾都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故而在北京这座舞台上展示的历史画面其色彩尤为强烈，其内容也更具有无可比拟的震撼力。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继两宋之后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东南地区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商品货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其社会内外矛盾也十分严重。首先，明灭元以后，撤往漠北的蒙古贵族一直没有放弃对明朝北边的骚扰。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在今河北怀来县土木堡被蒙古瓦剌部俘虏。此后明英宗虽然被送回北京，并通过夺门之变重新占据帝位，但明朝的虚弱与无能已暴露无遗。此后近二百年，明与蒙古各部或战或和，北边始终未能平静。在辽东地区，女真族大体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分，明朝设卫进行统治。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左卫努尔哈赤拥父、祖遗甲十

三副起兵，攻打同属建州卫的苏克苏护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为父、祖复仇。努尔哈赤有勇有谋，连战连胜，势力强盛，最终统治了建州三卫。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佥事。此后，努尔哈赤又攻略长白山、鸭绿江地区，晋为建州卫左都督。在长达 20 余年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对海西女真和被称为野人女真的东海女真诸部取得巨大胜利，逐步建立起统治制度，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西南）建立金国，建元天命，史称后金。此后，后金又改国号清，努尔哈赤被迫尊为太祖高皇帝。后金政权建立以后，努尔哈赤随即对明朝发动大规模进攻。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二月，努尔哈赤聚众誓师，以“七大恨”告天，控诉明朝杀其父、祖，援助海西女真叶赫部与之对抗，以及驱逐边地女真农人等等，随即征明。四月，后金军攻占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千总王命印阵亡。后金以李永芳为总兵官，统辖降人，毁抚顺城而归。明总兵官张承胤率援兵来追，努尔哈赤出其不意回军反击，杀张承胤，胜利班师。五月，复征明，攻克抚安等五堡，平毁其城，将该地的粮食全部劫掠而归。七月，后金复发兵西入雅鹞关（今辽宁本溪苇子峪东北）攻克清河堡（今辽宁本溪东北清河城）明守将邹储贤、张旆败死，辽东震动。明朝政治腐败，军官克扣兵饷是家常便饭，军队装备很差，作战能力虚弱。同年闰四月，明朝以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掌管辽东军事。同时，在全国征收“辽饷”税银三百万两，从各地调集军队，准备征讨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正月，四方援辽之师会集，明廷催促杨

镐出兵。二月，杨镐将各地援辽之师 8 万余人分为四路出击，号称 47 万，计划围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三月，明总兵官杜松所率西路兵与后金军战于抚顺以东的萨尔浒，大败，杜松战死。后金军复转攻明总兵官马林部于尚间崖，又获大捷。马林败逃，监军潘宗颜等身死，明北路兵也告败溃。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杨镐急令南路李如柏部和东路刘綎部退兵。结果，只有李如柏得以全军而退，刘綎和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所率援军自宽甸深入三百里，被后金击溃于阿布达里岗，刘綎战死，姜弘立投降。后金在四日之内就歼灭了明朝四路中的三路征讨之师，剩下的一路也仓惶而逃，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史称萨尔浒之役。同年六月，后金军又攻陷开原（今辽宁开原东北），明总兵官马林战死。明廷改以大理寺丞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辽东经略。如果说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明朝抚顺、抚安、清河等地尽失是失去了辽东屏障的话，那么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萨尔浒之役的惨败就是明与后金在辽东军事形势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后金对明朝一直采取攻势，而明朝则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九月天启皇帝即位，十月以辽东巡抚袁应泰代替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军攻克沈阳不几日又攻克辽东军事和政治中心辽阳，袁应泰兵败自杀。北京宣布戒严。六月明廷重新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此前明廷已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后金在对明作战的同时，还对北边蒙古各部也进行了征服性的战争，至明末崇祯之世，蒙古各部都先后归附后金，成为后金精锐的军事力量。

与此同时，明朝境内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矛盾。早在万

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发动四路大军进攻辽东后金失利溃逃的士卒相率西奔，经河南、山西，在陕西开展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明天启、崇祯之世，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北方地区尤为严重。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澄城县农民不堪忍受地方官府的催逼租税，奋起杀死酷吏知县张斗耀，举起义旗，正式揭开了明末陕西农民起义的序幕。陕西各地饥民纷纷揭竿而起，府谷县、清涧县，汉南、阶州等地也先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崇祯之世，陕西边兵多年缺饷，固原、阶州等地区的饥卒也相率发生兵变，加入农民起义队伍。陕西延安人张献忠和米脂人李自成最终在阶级斗争的浪潮中成为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和明朝封建统治的掘墓人。在这样严重的内外动乱中，明朝政权内部朝臣的朋党之争和宦官祸乱不断，统治集团极为腐朽，贵族、宦官、官僚都以搜刮、贪赃为能事，统治能力衰落。明末著名民族英雄袁崇焕就是在这样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演绎了自己崇高而悲壮的人生。

一、袁崇焕忠心报国，蒙冤被害

袁崇焕，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后于嘉靖年间迁入广西藤县。袁崇焕敏而好学，先入县学，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考中进士，授福建邵武县知县。他虽然只是一个七品小官，但胸怀大志，具有胆略。当时，西北边地未靖，蒙古诸部不时骚扰；东北边事又起，努尔哈赤率后金军大败杨镐，边警日急。袁崇焕出于爱国热忱，远在福建，十分关心北方战事，常与朋友讨论用兵之策。每当遇到从北边返乡的老弱士卒，他就热心向他们了解边塞上的事情。他同中国历史上无数爱国志士一样，以天下为己任，在国难当头之际，渴望横戈跃马于疆场，建功立业。袁崇焕以边才自许，在社会上多少也有一些名声。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他按例赴北京朝觐时，受御史侯恂举荐，破格录用为兵部职方主事，从此得到一展宏图的机会，时年 38 岁。

年近不惑的袁崇焕意气风发，以身许国，誓将有所作为。他上任没有几天，正逢后金军攻明西平堡。明广宁巡抚王化贞素来轻敌主战，与经略熊廷弼不和。他没有仔细考察敌我双方情况，好大喜功，轻率地出动广宁（今辽宁北镇）全部守军 10 余万迎敌。明军与后金军遇于平阳桥，一触即溃，全军奔逃，不可阻止。王化贞部下中军孙得功降后金为

内应，在广宁城内制造混乱。王化贞只好弃广宁南逃。熊廷弼率部下五千明军，与王化贞会于大凌河，于是一同护难民入山海关。广宁、义州相继陷于后金。山海关是北京东面门户，所谓“广宁不守则山海震撼，山海不固则京师动摇”^①。所以当明军从关外退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北京立即闻警戒严，朝野震骇。袁崇焕不顾个人安危，闻警后没有通知任何人，单骑出关，考察形势。就在兵部和家人连日四处寻访他时，他安然从关外回来，详述边关的攻守形势，并英气勃发地说：只要有充足的兵马钱谷，我一个人守在那里即可击退来敌。各位朝臣听了他的分析，无不赞服。兵部都给事中蔡思充上疏，称赞袁崇焕和原辽东兵备阎鸣泰均饶有才略，堪当大任，宜分任山海关守御之责。于是，袁崇焕被擢升为山海关监军佥事，阎鸣泰为山海监军副使，并发帑金 20 万，命招募士卒。广宁失守后，明廷命兵部侍郎王在晋为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蓟、天津、登、莱军务。当时后金兵力有限，前锋至明中左所（今辽宁锦西东北）即退回，只据有广宁等地，蒙古喀喇沁诸部乘虚而入，山海关外除个别据点外，大多被后金、蒙古控制。不久，喀喇沁诸部款服，袁崇焕受命恢复山海关外明军据点。他先出关驻广宁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前所）监管参将周守廉、游击左辅二军 经管前屯卫（今辽宁绥中前卫）事务，又受命前赴前屯卫安置流民复业。前屯卫距山海关较远，当时敌情仍很严重。袁崇焕不畏艰险，选择人迹罕见、荆棘丛生、虎兽出没的小道，在夜色掩护下强行军，天亮前抵达前屯卫城堡。将士们都惊叹

^①《明熹宗实录》卷 18，天启二年正月甲子。

他的胆略。王在晋对袁崇焕也十分倚重，擢升为宁前道兵备佥事。但王在晋只是一位见识一般的官僚，胸无大志，更无远略。他主张弃关外大片土地和百姓于不顾，在山海关外仅 8 里左右的八里堡筑重城作为防守之地。袁崇焕从恢复辽东失地出发，主张在山海关与广宁之间的冲要——宁远（今辽宁兴城）筑城驻守，这样明军进可以据锦州，图广宁，退则可以据宁远，护山海关，保证京师无虞。两人争持不下，上报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不了解实际情况难以决断。大学士孙承宗自请行边，视察情况，以作定夺。结果，孙承宗采纳袁崇焕的建议。同年八月，孙承宗自请督师，取代王在晋掌管辽事。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开始实施收复关外失地的计划。

天启三年（1623 年）九月，孙承宗命亲信、副总兵满桂与袁崇焕率兵出驻宁远。袁崇焕规划城防，修葺城垣，定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底广三丈，上宽二丈四尺。明游击祖大寿原来协助参将金冠守觉华岛（今辽宁兴城东南菊花岛），这时与参将高见、贺谦督掌修城工程。第二年完工，宁远城遂成为关外重镇。袁崇焕与满桂齐心协力，精心防守，抚慰百姓，发展生产，宁远地区社会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商旅辐辏，流民复业，一时间竟成为关外的一方乐土。天启四年（1624 年）九月，袁崇焕和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经北镇、十三山、右屯，抵达后金势力范围西境，然后由水道浮三岔河入海而还。天启五年（1625 年），孙承宗在与袁崇焕商议之后，遣将分别收复宁远以东的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河地区，每处都修缮城郭，派军队驻守。这些地区又成为宁

远的屏障。由此，明军收复了关外丢失的近半屯地，开疆复二百里。不料，同年十月孙承宗因受魏忠贤阉党排挤，被迫去职。明廷以兵部尚书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高第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主义者。他认为关外必不可守，不顾袁崇焕和通判金启倬的反对，尽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和松山、杏山、塔山各处城防守具，将屯兵全部撤回山海关内。由于行动仓促，明军丢弃米粟达 10 余万石，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军散。高第还想撤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和广宁前屯卫二城，袁崇焕断然拒绝，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①高第无奈，只好姑且任之。在袁崇焕的坚持下，宁、前二城虽然仍在明军手中，但由于其东北的锦州、右屯、大小凌河等地均已放弃，所以直接暴露在后金面前，孤悬山海关外，处境十分危险。昏庸无能的高第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把孙承宗、袁崇焕苦心经营数年得到的关外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断送殆尽。果然，后金见高第软弱可欺，次年（1626 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军五六万之众，大举进攻，西渡辽河，长驱直入，合围宁远。二十三日金军抵达宁远后，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彻底切断了宁远和后方的联系，使宁远城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城。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文武大臣均无计可施，都认为宁远必然失陷无疑。实际上，袁崇焕在宁远已及时得到潜伏在后金军中爱国志士刘兴祚传送的情报，迅速坚壁清野，在交通要道设防以查拿间谍，作好了迎敌的准备。袁崇焕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参将祖大寿等集合众将士，誓死保卫宁远。他当众写下

① 《明史·袁崇焕传》。

血书，激发众将士的报国之心。将士们群情激昂，誓与宁远共存亡。袁崇焕还命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有宁远将士逃到他们那里的，一律斩勿赦，于是更坚定了宁远军民的斗志。努尔哈赤率后金军围宁远后，见诱降不成，便于次日发动进攻，命士兵挖地道攻城，不避矢石，十分凶猛，宁远城垣一度被攻破一丈有余。袁崇焕身先士卒，亲自推小车运石块填补城垣缺口，左臂受伤后，撕裂战袍包裹伤口，仍不退阵。在他的激励下，明军一反往日懦弱之状，奋勇搏杀，很快修补好城垣缺口。袁崇焕又调来福建炮兵，使用西洋大炮轰击城外敌军，击毙后金军数百人，才遏制了后金攻势。自正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后金围攻三天，屡攻不克，伤亡数千，其中还包括数员将官，无奈只好退兵。临行，努尔哈赤派武讷格率蒙古八旗袭击宁远附近的觉华岛，尽歼明守军，焚掠一空，作为报复。明军取得了宁远防御战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宁远之役，明宁远守军只有一万，与后金军相差数倍，但由于袁崇焕指挥得当和士卒的勇敢，竟取得了胜利。经过这次战役，后金锐气严重受挫。二月，努尔哈赤班师回到都城沈阳^①后，气愤地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用兵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何独宁远一城，却不能攻下呢？”由于伤病和失败后心情忧闷，当年八月努尔哈赤以 68 岁高龄去世。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改明年为天聪元年。

天启六年（1627 年）二月，明廷以袁崇焕有功，升为

^① 后金自天命元年（1616 年）定都赫图阿拉，又先后迁界凡、萨尔浒、辽阳，天命十年（1625 年）定都沈阳，后称盛京。

右佥都御史，专理军务，驻宁远。三月，又以原职加巡抚辽东、山海等处。明廷又以高第畏敌而罢免，以王之臣代替高第为辽东经略。王之臣督师山海关内，袁崇焕督师山海关外。明廷对袁崇焕十分倚重，不久又罢辽东经略一职，山海关内外军务都由巡抚袁崇焕一人督领。袁崇焕由一位普通的兵部职方主事成为持有自主大权的封疆大吏。他治理辽东的方略是，用辽人守辽土，且战且守，且筑且屯。这样，一方面可以长期驻守，军民融合一体，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政府挽运军粮的负担。他巡历大、小凌河，大兴屯田，逐渐恢复了高第丢弃的关外旧土。努尔哈赤死后，他派使者和李喇嘛以吊丧为名，赴沈阳窥探后金虚实。天启七年（1628年）春，后金发兵东征朝鲜。袁崇焕为了向前推进关外前哨，以确保山海关的安全，就在后金东征前后，派使者与后金帝皇太极议和，以争取时间重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三城建成之后，或战或守，明与后金的战争都将在山海关四百里外进行，可以避免将山海关暴露在敌人面前，保证北京的安全。不料，后金对朝鲜的战事很快就结束了。三月，后金军班师。五月十一日，皇太极便以为父报仇为名发大军直指锦州，四面合围。明锦州守将赵率教和监军太监纪用先以讲和为名拖延时间以待援兵，后又据城固守，拒不投降。袁崇焕在宁远命祖大寿等率精骑四千出城，从敌军背后袭击，以援助锦州。十二日后金攻锦州失利，皇太极派使者回沈阳调来援兵，二十八日又去攻打宁远。袁崇焕率众将士登城防守，发炮轰击。满桂率关内援兵与祖大寿率领的精骑在宁远城外冲锋陷阵，虽然伤亡严重但斗志不减。皇太极见宁远难以攻克，便于六月初四再回师攻锦州，仍不能克。这时天气已逐

渐暑热，后金士卒伤病众多，皇太极只好引军而归。撤兵时，将明军还没有来得及修复好的大、小凌河二城平毁。这次战役，明军发挥凭城固守和大炮的优势使得精于平原野战的后金军无计可施，在宁、锦之间疲于奔命，伤亡惨重，取得防守战的胜利。这是明军继宁远大捷之后取得第二次胜利的保卫战，史称宁锦大捷。

然而，如果说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大捷曾为袁崇焕带来荣誉、晋升和朝廷的信任的话，那么天启七年（1627年）的宁锦大捷却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荣誉，反而遭到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一党的诬陷，在政治上陷入困境。阉党御史刘徽和工科左给事中陈维新等禀承魏忠贤的旨意，上奏天启皇帝说：袁崇焕以扫平后金自许，却出人意料地派人与后金讲和。名义上说是借讲和为名，以便争取时间修复锦州、大小凌河等城，但实际上后金不但在此期间征服了朝鲜，而且西犯锦州。他们还攻击袁崇焕扬长避短的正确作战方针，认为他没有发宁远兵驰援锦州是畏敌的懦弱行为。天启皇帝竟然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皇太极攻打宁、锦是袁崇焕派李喇嘛等去讲和招来的祸害，而宁锦大捷全是魏忠贤为首的太监们“殫心筹画，委任得人之效”^①。

在明末朋党林立、宦官专权的时代，袁崇焕在没有任何政治势力集团支持的情况下，以自己超人的胆略和见识，拔出众官僚之上，很遭人忌恨。早在宁远大捷之后，虽然他官升右金都御史、辽东巡抚，但已预感到自己会因功高而招谤。他在给天启皇帝的上疏中说：“勇猛图敌，敌必仇；奋

^① 《明熹宗实录》卷 86，天启七年七月丙寅。

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招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篋，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①也就是说，建功立业必然会招致来自敌、我两方面的仇恨和妒嫉；而要建立奇功，更可能临事考虑得不那么周全而获罪。所以，他寄希望于皇帝和朝中大臣的支持。当时刚取得宁远大捷不久，朝廷对袁崇焕正多有倚重，所以多加宽慰，表示绝对信任。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宁远大捷后，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明廷开始设各边镇监军太监，派太监去监视各地军务。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纪用监军山海关、辽东地区。袁崇焕愤而上疏朝廷，表示反对，却不被理睬。当袁崇焕与经略王之臣发生矛盾，托病终制，请求辞官时，天启皇帝虽然对他作出让步，召回王之臣，罢经略一职，将关内外军务尽属袁崇焕一人，但仍强调，袁崇焕作为巡抚，所有事情必须和负有监军之责的刘应坤、纪用商议后才能行事。天启皇帝驾驭臣下之道，可以说是十分矛盾和愚蠢的。他既想倚重臣下建功立业为保住朱明江山而卖命，又对巨下怀有深深的猜忌，深恐臣下功高震主，威胁到朱氏的帝业。袁崇焕性格刚强、果断，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时与上司及同僚发生矛盾。当他还是宁前兵备佥事时，就为辽东战略问题和上司、经略王在晋争得不可开交，以致于告到首辅叶向高面前。其后，他虽然受到孙承宗的重用和支持，但他在巡查营伍时擅自杀了一个虚报兵饷的军校，也曾招致孙承宗的怒叱，说：你身为监军，难道有权擅行诛杀吗！这件事虽然以袁崇焕谢罪而罢，但在同

僚中，毕竟给人以骄傲的感觉。宁远之役，总兵满桂作战有功。袁崇焕感到他意气骄矜，不好驾驭，于是以恐坏边事为由，奏请朝廷将他调往别镇。他为了满桂的去留，与经略王之巨发生牴牾。王之臣举荐满桂，袁崇焕反对，而袁崇焕举荐赵率教，王之臣又反对。在封建社会的官僚机构中，这一系列的人事矛盾，也成为袁崇焕日后的祸机。加之，天启末年，大太监魏忠贤权势炙手可热，如日中天。他以反对东林党为名，大兴冤狱，铲除异己。满朝文武官员、包括部分宗室贵族对魏忠贤都侧目而视，百般迎合。天启七年（1627年），阉党公然请为魏忠贤立生祠，颂德献媚。朝廷内外，一时风从，唯恐被魏忠贤一伙视为异己而遭到迫害。在这样的压力下，袁崇焕不得已，只好违心表态，于同年四月上疏，请求在宁远为魏忠贤建生祠。即使如此，他仍躲不过阉党一伙的攻击。宁锦大捷后，那些在朝中擅权的魏忠贤一党都冒功受赏，得到升官、赐荫、赐银的嘉奖，连魏忠贤的从孙魏鹏翼也被封为安平伯，而冒死守城，担任大战三次、小战二十五次、无日不战的指挥重任的袁崇焕竟只升一级，实在令人心寒。如果说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只身出关视察军情时是意气风发、满腔热血的话，那么天启七年（1627年）宁锦大捷以后，在阉党的打击下，他已是心灰意懒了。七月，袁崇焕被罢官，回广西藤县家乡闲居。

袁崇焕罢官后一个多月，天启皇帝病逝，其弟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明朝末期的两位皇帝都很年轻。天启皇帝去世时只不过 23 岁，崇祯皇帝即位时更只不过 17 岁。平心而论，崇祯皇帝是想有所作为的。他即位以后，当年十一月就将魏忠贤遣送凤阳，又追下

诏命，令逮捕治罪。魏忠贤行至阜城，听说诏命已下，知道无计可逃，遂自缢而死。与魏忠贤通谋作奸的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在北京被鞭苔处死。魏、客二党的主要分子魏良卿（魏忠贤之侄）侯国兴（客氏之子）也被押上刑场斩首。阉党兵部尚书崔呈秀也被罢免，回到蓟州家乡，畏罪自杀。

崇祯皇帝诛灭魏、客二党，撤走派往各边镇监军的太监，并为受诬陷的大批官员恢复名誉，加以起用。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在家乡闲居不到百日就又辞母别家，应召入京。袁崇焕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重新走上了辽东战场。这次，由于他得到了皇帝前所未有的重用，信心似乎充足。七月，袁崇焕从家乡抵达北京，上疏陈奏平辽方略，详述自己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屯军驻守之计和“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的战守方针^①。崇祯皇帝在大内平台召见他。他当面慨然承诺：只要能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五年时间全辽可复。崇祯皇帝闻言自然大喜过望，赐尚方宝剑，委以临事专决之权。八月，袁崇焕自北京抵达山海关。应该说，他作为督师出关，其身份和事权都比过去威风得多，但他内心的矛盾也比过去复杂得多。经过天启七年（1627年）的政治挫折，他深深有了从政艰险的体会。虽然朝中魏忠贤阉党已经除去，但其余孽仍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朋党林立、互相攻讦的局面并没有改变，他随时都有获罪的可能。更何况，原辽东经略熊廷弼因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兵败一事，受

^① 《崇祯长编》卷7，崇祯元年七月乙亥。

诬被杀，传首九边，身首异地，数年不得归葬；孙承宗身为大学士，恢复辽土有功，但也因受魏忠贤一党攻讦而被迫辞职，殷鉴不远，这些事例都不能不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阴影。当他在平台受命时，曾当面向崇祯皇帝提出，希望皇帝任命臣下时，任而勿二，信而勿疑。他还说：“边臣与廷臣的驾驭之道不同。因为边臣任职边镇，远离京师，难以随时被君王了解，而军伍中凡事又不可能都公开宣扬，在外人看来可惊可疑的事情很多。因此，君王只要看边臣守土作战成败之大局就可以了，不必指摘一言一行的小过错。另外，边臣事权既重且专，不可避免要随时独立作出种种决定，必会招致很多怨言，凡对国家边疆有利的东西，大多不利于边臣本身。况且，与敌人作战的紧急时刻，敌人也会想方设法离间我方，所以边臣所处的地位实在是非常困难的。虽然陛下信任我，我本不必有那么多疑虑，但边事中确实有很多危险的陷阱，我不能不事先向陛下申告。”崇祯皇帝当时以好言相答，并接受了他的一切请求，但伴君如伴虎，一旦崇祯皇帝取消了对他的信任，他的下场又会如何呢？况且，他对崇祯皇帝作出的“五年复辽”的承诺本没有多大把握，只不过是解除崇祯皇帝忧虑的宽心话而已，将来届期不能实现，他岂不是要承担欺君之罪？可以说，袁崇焕是身负沉重的责任，怀着复杂、矛盾的心情出京赴关的。但是，袁崇焕毕竟不愧是一位以国事为重的爱国民族英雄。当他抵达驻所后，立即精神抖擞地投入到边务中去。当时宁远驻军因缺饷数月而发生兵变，他迅速平息变乱，奖惩分明。他沙汰冗兵，整顿营制，加强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他还精简重叠的指挥系统，关内外只设赵率教、祖大寿二员大将。赵率教镇山海

关，祖大寿镇锦州。为了事权专一，他又将宁远、锦州合为一镇，全归祖大寿统管。中军副将何可刚加都督佥事，驻宁远，也受祖大寿统率。袁崇焕本人驻守在山海关与锦州之间的宁远，以控制前后方的局势。在袁崇焕的精心策划下，明军关外防线布局严密，进退有据。

袁崇焕认为，要想使复辽事业取得成功，首先要专一事权，因此上任伊始就着手处置不听朝命，桀傲不驯，孤悬海外的明总兵毛文龙。毛文龙是钱塘人，天启年间以都司援朝鲜，始长期逗留在辽东。以后，辽东失于后金，他从海道率兵逃回，乘虚袭杀后金镇江（今辽宁丹东东北）守将，受当时辽东巡抚王化贞宠信，授为总兵，累加至左都督，挂平辽将军印，赐尚方宝剑。他设军镇于皮岛（今朝鲜椴岛，当时又称东江），与本土隔绝。明廷虽然授予他官职，实际上并没有办法真正驾驭，只是羁縻而已。毛文龙在东江自筹兵饷，借口通商，进行海上走私活动。天启年间，后金需要的物资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毛文龙，毛文龙则将得自后金的人参、貂皮等珍奇异物用来贿赂朝中显贵，因此得到掌权的魏忠贤阉党庇护，更加肆无忌惮。同时，他还谎报兵额，向朝廷骗取饷银。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受命督师辽东，在离京前曾与大学士钱龙锡商议过处置毛文龙的方略，并上疏请求遣官去东江清理毛文龙部的饷额。毛文龙惟恐受文官监制，上疏坚决反对，其专制海外的野心已显露端倪。自崇祯元年（1628年）正月至十月，毛文龙还与后金皇太极书信往来，以议和为名，行通敌之实。他在致皇太极的7封书信中，先是大言相许，称自己是奉命海外，专制一方，奏本一上，和事易成，以博取皇太极的信任；后又议降，劝皇太

极发兵取山海关，自己自海道取山东，然后南北夹击北京。他无耻地对皇太极提出条件，说：“我不分疆土，但也不属你管辖。”他一方面以明朝专制一方的封疆大臣自居，在后金面前挟明朝以自重；又一方面向明廷吹嘘自己兵力强盛，牵制后金有功，挟后金以要胁，索要粮马兵饷。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在他与皇太极书信往来时，一次后金秘密派遣的使者廓廓等人在皮岛误上了户部的运粮船，露了马脚。毛文龙便将廓廓等人逮捕，押解北京，摆脱牵连，换取明廷的信任。袁崇焕见毛文龙既不服从调度，又有私通后金嫌疑，不除掉这个大患就会影响复辽大业，于是在布置山海关内外兵力妥当之后，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十二日以阅兵为名，登舟出海，与毛文龙约会于双岛（今辽宁旅顺市以西）。二十八日，袁崇焕抵达双岛，次日晚毛文龙也应约抵达。袁崇焕起初并没有必杀毛文龙之心。他与毛文龙密谈三日，但毛文龙一一拒绝了他提出的所有关于整顿皮岛兵马和涉及皮岛事权的建议。他又劝谕毛文龙解甲还乡，终老山泉，但毛文龙不但不以为然，反而说朝鲜衰微，可以据有其地，进一步暴露出其谋划雄踞海外、称霸一方的野心，这对于袁崇焕的复辽事业不能说不是一个巨大威胁。于是袁崇焕决计铲除这一大患。六月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观看军士角射，先设帷帐于山上，令参将谢尚政等率甲士伏于帷外。毛文龙率部到达，卫士只放过毛文龙和从官，将其部卒挡在外面。袁崇焕携毛文龙等登上山顶，出其不意，一举成擒。袁崇焕当场宣示毛文龙专制一方，不受文臣监核；杀降人、难民以冒功，欺君罔上；有叛逆之心，大逆不道；侵盗军粮；私自开市，私通外番；令数千名部将都改姓毛氏，以